

《资本论》创作史

〔苏〕维·索·维戈茨基

福建人民出版社

《资本论》创作史

〔苏〕维·索·维戈茨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福州

ВСВыгодскиа

КИСТОРИИСОЗЛАНИЯ

《КАПИТАЛ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1970

《资本论》创作史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125印张 193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50

书号. 3173·287 定价: 0.87元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维·索·维戈茨基，是苏联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和《资本论》创作史的专业科研人员，是苏联经济学博士。他于1965年写成的《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注意。

《〈资本论〉创作史》出版于1970年，是上一著作的姊妹篇，作者称它是上一著作的“直接继续”。如果说《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考察的只是马克思1850—1863年期间制定经济理论的过程，那么本书则大大扩大了考察的范围。它论述了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和创作《资本论》历时四十年的全过程，阐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整个发展史。关于马克思1863年以后的理论创作过程，占了本书一半的篇幅，是对上一著作的重要补充。作者按照自己提出的标准，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发展作了新的分期，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同时，根据他在上一著作出版后研究的新成果，改进了上一著作论述中的一些缺陷。作者还在本书中考察了马克思经济研究的方法，说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列宁制定经济理论的出发点。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学术界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

* 本书中作者认为《资本论》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有三个手稿，最后一个手稿（第三稿）为1863—1865年手稿。现据《德国哲学动态》1982年第4期所载，维戈茨基等人在《马恩年鉴》1982年第5期上写了《关于马克思1863—1867年著作的分期》一文，主张重新分期，即不是1863—1865年手稿，而是1863—1867年手稿。

的状况，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作者的观点，以及他作为附注所引用的材料，我们当然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通过研究，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本书适宜于作大专院校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的参考书，也可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参考书。

本书由十一位同志共同翻译。刘品大（贵阳师范学院）：作者的话、第一章；弓孟谦（北京大学）：第二章；张钟朴（中共中央编译局）：第三章；周成启（贵阳师范学院）：第四章；王方中（中国人民大学）：第五章、第八章；郭继严（中国人民大学）：第六章；朱邦芳（北京大学）：第七章；蒋应铨、谢合宽（贵州工学院）：第九章；李善明（四川大学）：第十章；吴世泰（四川师范学院）：第十一章。译文由刘品大统一校订，最后又经周成启阅改。

译文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八月

作 者 的 话

本书是作者前一本书《卡尔·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思想》出版社1965年版）的直接继续。该书研究了马克思在1850—1863年期间创作的《资本论》。作者在本书中打算考察马克思制定经济理论整个四十年期间所进行的工作。书中对《资本论》的历史是从马克思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角度去考察的，这是因为创立这一理论正是马克思多年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目的。马克思从事的理论工作向来是服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是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首先也是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解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总结构中的地位，并指出工人阶级将来所面临的前景。

马克思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始终是同制定经济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表述，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同制定）——的结果。唯物史观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的和经济的研究工作而形成，并为马克思的未来经济理论建立了方法论基础，从而为今后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制定了纲要。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首先是从唯物史观中得出的。诚然，如果说构成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基本的、决定性的，那么只有研究这种关系才能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指出这一发展的前景。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

在理论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1850—1863年所完成的第二个伟大发现——的过程中，第一，论证了，因而也证实了唯物史观本身，使唯物史观由天才的假设变为科学地证明了的理论，从而使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也得到了论证*。第二，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过程中，得到了能够大大加深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新的成果。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制定和在此基础上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以及在这些理论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研究，这一切都使马克思有可能从经济上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在经济研究的过程中还揭示了有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状况和斗争的最重要的规律性。最后，在对共产主义经济的科学预测方面也获得了重大成果。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制定和论证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创立而逐步开展起来的，正如这个学说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才能真正被人们所理解一样，否则它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教条式地，即不正确地、加以歪曲地来领会。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结论也是这样，这些结论是他在这个或那个历史时期作出的，不能脱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成熟程度去引用。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在考察上述结论时必须注意它们在形成和发展上的历史连续性*。

*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在阿·米·鲁缅采夫的许多著作中作了专门的考察（参看阿·米·鲁缅采夫著：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马克思与当代》，莫斯科1968年版，第113—132页；《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与当代》，莫斯科1968年版，第36—45页；在卡·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社会主义的经济论证的原则，《卡·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经济》，莫斯科1968年版，第5—22页）。

* 恩格斯在1886年写道：“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存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成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71页）

当然，马克思制定经济学说的历史，包括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历史，并不是在1863年结束的。马克思在世的后二十年，不仅为进一步发展经济理论而紧张地工作，而且作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准备工作，并出版了三版《资本论》第一卷。在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活动的期间（1864—1872年），以及在这以后，马克思一直在加紧制定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运用自己的经济理论去解决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具体问题，制定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这个时期的特点还表现在马克思对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怀有极大的兴趣，为此他作了超出《资本论》范围的专门研究。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和重大发展。

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注意到“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系统地加以研究，使我们能够得出马克思进行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的某些特点，而马克思的方法论对研究我们当代的现实情况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本书最后一部分是考察马克思运用的方法的特点，以及这个方法在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

在研究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应用于当代的问题时，作者力求做到这一点，即强调这一理论包含着对于解释我们的现实情况能够加以具体化和展开的一切必要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重要的特点在列宁的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列宁的著作在方法论的原则方面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而且大大地补充了后者，是以真正辩证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宝贵典范。那些关于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问题的著作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在这方面只需指出列宁历史地把唯物史观从假设变

为科学证明了的原理所作的评价就足够了，这个评价包含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著作中。列宁所有其他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著作也证实了这一天才的评价。

本书的任务不包括考察现代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所作的解释。因为这是不可能顺便提一提就行的，它应当是专门研究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想强调指出这一事实，即最严肃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现在也远不是笼统地否定马克思了。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维·列昂捷也夫写道：“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是直接进行研究工作的，他有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目前许多理论是派生的，好象是借用第二手的东西……在三卷本《资本论》中关于利润、工资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动可以找到比合众国国情调查的十卷出版物更切合实际的和原始的材料……”²

但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们在承认学者马克思的同时，常常想把学者马克思同革命家马克思分离开来。尤其是他们断言，比如法国研究马克思学的姆·柳贝尔，说什么马克思一向是由社会主义走向科学，而不是由科学走向社会主义的，马克思的革命信念先于科学的实证；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完成，因而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没有实现。对诸如此类说法的最好驳斥就是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这样做能够揭示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革命论断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本书中，作者打算在这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努力。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	(1)
第二章 《资本论》的前史.....	(30)
第三章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批判分析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起点和完成.....	(42)
第四章 《资本论》的最初稿 (1857—1859年)	(75)
第五章 《资本论》的第二稿 (1861—1863年)	(91)
第六章 《资本论》的第三稿 (1863—1865年)	(111)
第七章 《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 (1867—1879年)	(131)
第八章 马克思经济研究的创作活动.....	(174)
第九章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工人阶级.....	(186)
第十章 马克思的理论是列宁考察帝国主义的出发点.....	(199)
第十一章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	(211)
注释	(229)

第一章 马克思经济理论 的不同发展阶段

《资本论》的“外史”和“内史”。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态度。研究“表面的”和“深处的”经济范畴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对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科学预测。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史的概述和分期。

详细研究《资本论》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对于创造性地掌握这一理论，以及顺利地应用于解释我们当代的现实情况，是一个决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研究《资本论》的历史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迫切需要。

这里所指的不是《资本论》的“外史”，它可以从1867年4月10日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开始叙述，当时马克思冒着风浪和恶劣气候乘坐轮船离开伦敦，两天后到达汉堡。马克思在汉堡将自己著作的第一卷手稿亲自交给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后者又将手稿转交给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当时出版过费尔巴哈的著作、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许多其他适于出版的严肃的科学书籍。无论这类事实多么引人注意，它们使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只是在《资本论》“外传”中包

含着它的“内传”——充满戏剧性的、体现在四卷《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创作史。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马克思为了创作《资本论》付出了四十年的辛勤、顽强劳动。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各个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成熟程度，而确定每个时期的成熟程度，即使是为了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至于把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失去意义的、发生了重要变化的那些思想或见解都当成是马克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言而喻，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方法是在理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分析这个理论本身。但是，这种分析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这样做，因为有几段整整的时间（例如1849—1856年这个期间）马克思没有写出政治经济学的专门著作。此外，分析某一段历史时期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实质，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得出同样意义的结果。比如，我们看来某些作者明显地过高估计了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所阐述的经济理论的成熟程度。在德·伊·卢森贝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的发展的主要著作中，断言《哲学的贫困》已奠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雇佣劳动与资本》则包含了这个理论的“核心本身”³。

看一看相反的例子。有时会遇到这样的说法，似乎级差地租Ⅰ理论只是在1865年在创作《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过程中，由马克思第一次制定的⁴。这是对马克思更早一些的手稿——《资本论》第四卷手稿（1862年）的成熟程度估计不足，在这里这一理论的某些原则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并不否认级差地租Ⅰ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了重大发展）。

马克思经济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是这一理论实质的表现，是从中得出的结论，因而可以成为理论本身的说明。这就象物理学

家根据感光胶片上留下的基本粒子的痕迹得出关于这些粒子本身性质的结论，地质学家根据对火山现象的研究得出地球内部结构的结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根据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某些表现来判断这个理论的发展的。这些表现是什么呢？

1. 可以断言，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本人经济观点的成熟标准。

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对马克思来说是研究现实情况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制定自己的理论，是二者合一的过程。马克思的经济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双重标题就表明了这个过程。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实质上的变化过程，这一点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的理解的演变。马克思在1844年对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批评性评语中还完全否定劳动价值理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中也反对劳动价值理论，否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有等价交换的可能性⁵。

到了1847年，马克思（显然也有恩格斯）放弃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全否定态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似乎已定出了进一步进行经济研究的出发点：首先应当批判地考察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理论。马克思强调指出：“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⁶。但是在《哲学的贫困》阶段，马克思仍完全坚持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克服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因而也还没有制定出他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引用了许多概述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引文，而且未加任何批判。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包含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是涉及它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即它所固有的反历史主义，以及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企

图。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得出的对价值的一切基本规定，同李嘉图所作的规定是一致的。例如，马克思说在竞争的条件下价值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的。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必要劳动的产物。李嘉图对价值也有这种规定——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作为引文之一加以引用，李嘉图说：“我们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接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到价值由于技术的进步而跌价，而且还强调“李嘉图已指出这个事实”⁷。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必要劳动的概念还是以最一般的形式提到。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把这一概念当作他的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特殊性质的学说的组成部分。在《哲学的贫困》中没有区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关于价值的基本规定，即以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来确定商品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必要劳动仅仅是在交换中通过商品的让渡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属性*。换句话说，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把创造价值的劳动看成抽象劳动。关于劳动的二重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产品的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是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中，即成为《资本论》最初稿⁸中第一次制定的。就这样马克思克服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1851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亚·斯密和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所占的地位作了明确的评价。马克思写道：“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

* 苏联的研究工作者奥·米·尤尼从价值理论的发展角度研究《资本论》，他把价值说成是社会必要劳动三个要素的体现：生产只是社会必要的产品，使用只是社会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产品只是按社会必要的数量生产（参看《卡·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莫斯科1967年版，第104页）。

情。”⁹但是，应该说，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持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感伤主义的看法。1853年3月4日马克思在照例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中写道：“首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贫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一贫如洗的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润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妨碍收入增长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来结算自己的纯收入！这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阐明的学说。”¹⁰接着，马克思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引用了李嘉图在《原理》中的话，然后又引用了西斯蒙第的话，因为西斯蒙第也批驳了李嘉图的这一论断。不错，马克思后来说，他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因为他力图保存已过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李嘉图进行论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1862年，马克思创作《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并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最终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特别是斯密—李嘉图关于价值与生产价格等同的教条，与此同时也对李嘉图的观点作了最深刻、最全面的评述。在这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马克思在1853年所批判的李嘉图的那个引文，在1862年又用作例子来说明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¹¹。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前半期否认劳动价值理论，这意味着还不存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所必需的出发点和前提。在四十年代后半期，虽然承认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是符合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映，批判这一学说的方法论原则，但没能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作彻底的、科学的批判，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的萌芽。最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既深刻又全面的批判分析，乃是马克思的经济理

论在这个时期业已制定的证明。

2. 其次，马克思对“表面的”经济范畴进行分析的那些理论的成熟程度，是马克思对“深处的”经济范畴进行研究的理论的成熟程度的标志。

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年）中第一次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的，手稿的这个部分称为《货币章》，并以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开始。这一情节有其深刻的方法论根据。因为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它是价值必不可少的外部表现。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也就是在研究对象时，总是由外部表现开始，进而深入到内部本质中去，他好象是一步一步地“摸到”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处去的。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是从批判李嘉图的货币流通理论和地租理论开始阐述自己在1851年的经济研究工作的最初成果的¹²。因此，马克思写作1857—1858年手稿，也是从考察货币理论开始的，然后从研究货币转入研究商品价值。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¹³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指出，货币理论是价值理论的直接结果，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因而也是错误的价值理论的结果，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所造成的结果。

可见，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范畴的理解，也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范畴的理解的标准。这同样也可以指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而言。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成熟程度，是他的价值理论成熟程度的标志。马克思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基本上同意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时，也是同意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赞同货币数量论，这个理论

的基础是，只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来看待。（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2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¹⁴ 这是李嘉图和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持的从数量上解释货币的典型观点。马克思后来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时，批判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确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已经完全被推翻了。”¹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提出了建立在个人交换劳动产品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货币的必要性问题，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强调指出，蒲鲁东所关心的问题，即为什么只是金银才执行货币职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次要问题，这个问题不应当用生产关系的总体系来解释，而应当用金银作为一种物质所固有的特性来解释。”¹⁶ 虽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的必要性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解决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在马克思制定他的价值理论的过程中，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之一才有可能解决。马克思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也证明了，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制定出自己的货币理论，因而不能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作彻底的批判。

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所制定的货币理论，同时也就成为马克思只是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创立自己的价值理论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的过程中还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开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处的”范畴，如价值和剩余价值，上升到较“表面的”范畴。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制定了自己的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润学说，并